

财政分权、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

——基于 1996—2007 年分省面板数据的研究

李国璋 刘津汝*

摘要: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式财政分权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设计。很多文献从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收益和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本文从财政分权带来的市场分割的角度,运用 1996—2007 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对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市场分割、财政分权程度及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一方面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带来的市场分割对其积极作用有所削弱,且对东部地区的削弱作用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各地区在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在同一个激励框架之下,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大于其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财政分权 市场分割 面板数据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8%,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所,学者们认为在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创新能力等传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方面,中国并无独特之处,因此学者们将目光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方面,而分权改革在众多制度安排中无疑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王永钦等 (2007) 认为我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由于我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中央以 GDP 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员一方面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去完善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 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 这种政治锦标赛模式也造成了各地区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和地区间差距的拉大, 这些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带来的积极作用。

经济学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如 Tiebout (1956) 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 因此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从而为本地居民提供质量更好的公共品, 本地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选择居住地, 进而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质量进行选择, 促进地方政府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品。Buchanan (1965)、Oates (1972) 等也认为中央向地方分配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以 Weingast (1995)、McKinnon (1997)、Qian 和 Weingast (1997) 等为代表, 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 认为分权化的制度安排可以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 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 促进和保持市场化进程, 调动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的积极性。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分权改革迄今取得的成就, 却没有分析分权制度改革的代价, 也就是说该理论只解释了为什么分权制导致的地方竞争是趋好的 (race to top), 但对分权制导致的趋坏的 (race to bottom) 竞争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周黎安 (2007) 认为分权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均与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独特方式——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有深刻的联系。因为晋升锦标赛模式将地方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 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

* 李国璋,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730000 电子信箱: ligzh@lzu.edu.cn 刘津汝,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730000

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龚六堂, 2005)。

在对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 学者们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运用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张晏和龚六堂(2005)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存在着跨地区效应。他们都认为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分权这样强的财政激励产生的地方之间的竞争是趋好的。但有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财政分权产生的竞争是趋坏的, 如陈抗、Arye L Hillman和顾清扬(2002)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加强了预算内财政收入的集权, 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扭曲, 从“援助之手(helping hands)”回到了“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s)”。周黎安(2004)也认为基于政治晋升激励的分权制度可能导致投资过度进入某个行业或项目, 甚至进行恶性竞争。张晏和龚六堂(2005)认为在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一种低效率的纳什均衡, 从长远来看, 造成参与竞争的各个地方政府“双输”的局面。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较多, 而财政分权的成本, 或者说对财政分权产生的对经济增长不利的方面的讨论较少, 有的是针对特定的区域, 如陈抗、Arye L Hillman和顾清扬(2002), 或者是进行定性的分析, 如周黎安(2004)。本文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研究对象, 选取1996-2007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对分税制改革后市场分割和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对财政分权的成本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对市场分割对财政分权的削弱作用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¹市场分割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做出了比较。本文的创新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我国的市场分割程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衡量, 将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程度利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方法进行合并, 并对其趋势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二是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计量分析, 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解释。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本文将采用的市场分割程度指标及财政分权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介绍并作简单的分析; 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市场分割程度及财政分权指标的计算方法

(一) 市场分割程度的计算方法

市场分割程度的计算方法很多, 现有文献中使用的有生产法(World Bank, 1994; Young, 2000; 白重恩等, 2004; 郑毓盛、李崇高, 2003)、贸易法(Naughton, 1999; Poncelet, 2002, 2003b)、经济周期法(Mody and Wang, 1997; Tang, 1998; Xu, 2002), 但这些方法都有其内在的缺陷, 具体的比较见于东华和刘运(2009), 本文采用更为直接的价格法(Parley and Wei, 1996, 2001; Fan and Wei, 2003; 陆铭、陈钊, 2006)来构造衡量我国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

价格法是用商品价格作为衡量市场整合程度的工具, 通过各地区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来考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状况。如果商品价格的变异系数或者价格在统计上存在趋同的现象, 则市场分割程度下降(于东华、刘运, 2009)。其思想来源于“冰川成本”模型(Samuelson, 1954), 该理论是对“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的一个修正。由于存在交易成本, 商品价值在贸易过程中会像冰川一样融化掉一部分, 因此两个地区间的价格不会完全相等, 只要相对价格 P_i/P_j 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 就可以认为两地之间的市场是整合的。

本文遵循Paresley和Wei(2000, 2001)以及陆铭和陈钊(2006)的方法来测算我国各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1996-2008年28个省份的环比价格指数(重庆、海南、西藏三省市因缺少若干年份的数据被剔除)。我们分别选取分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值指数和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来计算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④的市场分割程度, 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

¹ 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0个省。

^④ 本文采用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的数据选取方法与标准, 消费品共选取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及其用品、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与居住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八类; 固定资产投资品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程和器具、其他资本品三类;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三类。

方法将三个市场的分割指数合成我国 1996-2007 年的市场分割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 计算相对价格绝对值 $|\Delta Q_{ijt}^k|$, 在这里 i 和 j 分别表示两个相邻地区¹, t 为时间, k 为商品。由于我们获得的原始数据为各商品的环比指数, 因此用差分形式可以构造反映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 故定义:

$$\Delta Q_{ijt}^k = \ln(P_{it}^k / P_{jt}^k) - \ln(P_{i,t-1}^k / P_{j,t-1}^k) = \ln(P_{it}^k / P_{i,t-1}^k) - \ln(P_{jt}^k / P_{j,t-1}^k)$$

这样我们消费品市场得到 5 368 个 ($8 \times 61 \times 11$) 观测值, 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分别得到 2 013 个 ($3 \times 61 \times 11$) 观测值。

(2) 考虑到 $|\Delta Q_{ijt}^k|$ 并不全部都是由地区间的市场环境差异引起的, 还包含商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 从而造成由贸易壁垒形成的实际市场分割指数的高估, 因此我们采用 Parley 和 Wei (2001) 提出的方法对 $|\Delta Q_{ijt}^k|$ 进行去均值 (de-mean) 处理, 定义 $|\Delta Q_{ijt}^k| = a^k + \varepsilon_{ijt}^k$ 其中 a^k 为第 k 类产品自身的特性所引起的不随地区改变的价格变动, 而 ε_{ijt}^k 与 i, j 两地区的市场环境或其他随机因素所引致的价格变动。则 $|\Delta Q_{ijt}^k|$ 的均值定义为 $|\overline{\Delta Q_{ijt}^k}| = \overline{a^k} + \overline{\varepsilon_{ijt}^k}$ 接着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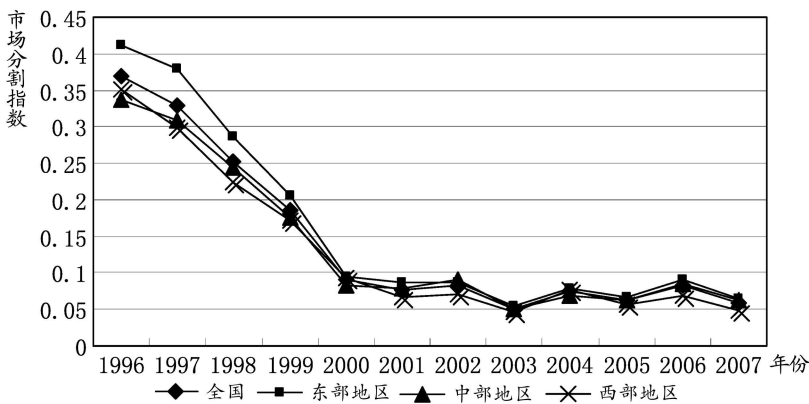
$$q_{ijt}^k = \varepsilon_{ijt}^k - \overline{\varepsilon_{ijt}^k} = |\Delta Q_{ijt}^k| - |\overline{\Delta Q_{ijt}^k}| = (a^k - \overline{a^k}) + (\varepsilon_{ijt}^k - \overline{\varepsilon_{ijt}^k})$$

这样就得到了仅与地区间分割因素和一些随机因素有关的 q_{ijt}^k 。

(3) 计算 i, j 两个地区在给定时期 t 内各类产品之间的价格变动平均值 $Var(q_{ijt}^k)$, 将 61 对相邻省份间的相对价格方差合并, 就得到了 28 个省、市、自治区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三个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

(4) 由于不同类型的市场分割指数不能通过简单的加总或平均得到综合市场分割指数, 因此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省的综合市场分割指数。

我们按年将各相邻省份的指标分别进行平均, 可以得到 11 年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分割指数 (见图 1), 从全国市场分割的情况来看, 1996-2007 年间, 我国的市场分割程度并非如 Young (2000) 和 Poncet (2002) 所揭示的那样愈演愈烈, 这一阶段我国市场分割程度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96-2000 年, 市场分割程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市场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 第二阶段是 2001-2007 年, 市场分割程度在徘徊反复中逐渐下降, 但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减慢。另外, 从图 1 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在三个区域中是最高的, 这是由于在东部地区中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 由于其直辖市地位使得其能够得到一些特殊的政策, 同时也可能使得邻近省份采取不合作的对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从而造成严重的市场分割 (桂琦寒等, 2006)。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计算得到。

图 1 1996-2007 年市场分割指数

从市场分割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 1) 也可以得出与图 1 同样的结论, 即东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 且从各区域市场分割程度方差的结果来看, 东部地区各省份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异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

为了验证我国的市场分割程度是否是一个有规律的收敛过程, 我们对市场分割程度进行面板单位根检

¹ 桂琦寒等 (2006) 认为,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因素可能成为相距很远的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天然屏障, 因此我们只计算相邻地区的相对价格绝对值。

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这类检验方法假设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 (common unit root process); 另一类为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这类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 (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很多，主要有 LLC 检验、IPS 检验、Fisher- ADF 检验和 Fisher- PP 检验，由于不同的检验方法各有优劣，为了保证检验的全面性，我们分别采用了上述四种方法对我国市场分割程度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在检验时，我们根据 Schwarz 准则来确定各序列的最优滞后长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市场分割程度的描述性统计

地区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全国	336	0.0587	0.0676
东部	120	0.0720	0.0803
中部	96	0.0516	0.0533
西部	120	0.0511	0.0621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运用 STATA 10 得到。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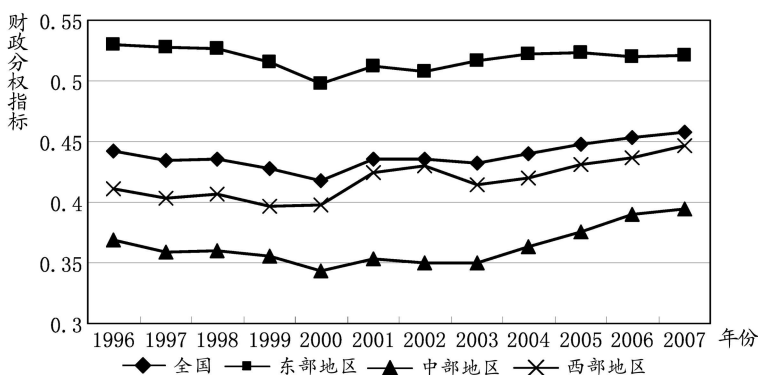
检验方法	统计量	概率	截面	观测值
原假设：各截面序列均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 Levin, Lin & Chu t^*	-82.4351	0.0000	28	286
原假设：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 Im, Pesaran and Shin $W-stat$	-68.5258	0.0000	28	286
ADF- Fisher Chi-square	469.367	0.0000	28	286
PP- Fisher Chi-square	462.530	0.0000	28	308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其接受原假设的概率在小数点后四位为零，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市场分割指数数据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我国的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过程，市场分割程度在不断缩小，市场在逐步走向一体化，这与刘小勇和李真 (2008) 以及赵奇伟和熊性美 (2009) 的结论相同。

(二) 财政分权指标的计算方法

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很多，如 Jin Qian 和 Weingast (1999)，Zhang 和 Zou (1998)，Lin 和 Liu (2000)，张晏和龚六堂 (2006) 针对我国实际分别计算了 12 个不同的总量和人均化分权程度指标，他们认为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与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的比值可以作为对事实分权的一种衡量，但他们的指标没有考虑人口规模因素。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拟采用乔宝云 (2002) 提出的计算财政分权程度的方法，即用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占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来衡量省级财政分权程度。

我们按年将财政分权指标分别进行平均，可以得到 11 年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指标 (见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1996-2007 年全国财政分权程度有所提高，东部地区一直保持在 50% 以上，基本保持不变，而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提升较快，其中西部地区从 1996 年的 40% 左右提高到 2007 年的 45% 左右，中部地区由于人口众多，因此利用人均指标计算的财政分权程度在三个区域中最低，但 10 年间也从 35% 左右提高到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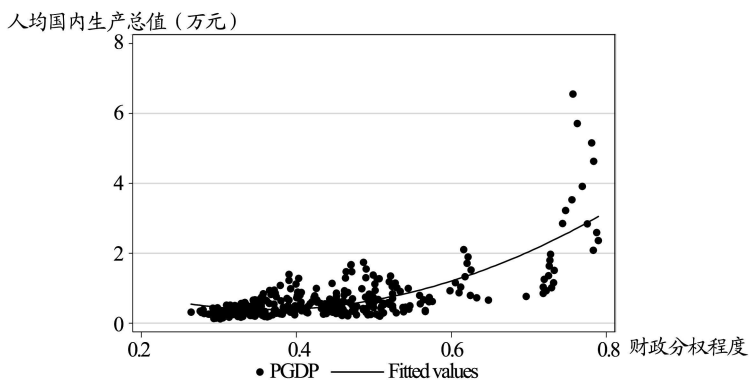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计算得到。

图 2 1996-2007 年财政分权指标

图 3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 与财政分权程度 (FD) 的散点图，Fitted Values 为 PGDP 与 FD 的拟合

线,从图中的拟合线可以看出财政分权程度与人均 GDP 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当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拟合线的斜率较小,说明财政分权程度对人均 GDP 的促进作用较小;当财政分权程度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之上,拟合线的斜率变大,说明财政分权程度对人均 GDP 的促进作用增大。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计算得到。

图 3 财政分权程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散点图

三、计量模型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0 + \beta_1'FD_{it} + \beta_2'FD_{it} \times SEGM_{it} + \gamma'X_{it} + \varepsilon_{it}$$

这里我们采用 1996-2007 年中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包含重庆、西藏、海南) 共 336 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 (Balanced Panel Data)。在上述回归模型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观测值, α_0 , β_1 , β_2 和 γ 为系数矩阵, ε 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 Y_{it} 表示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FD_{it} 表示财政分权度, $SEGM_{it}$ 为本文所测算的各省市场分割程度指标, X_{it} 是一组控制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对外开放程度 $OPEN_{it}$ (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投资增长率 K_{it} (用历年固定投资增长率表示), 国有化率 $STATE_{it}$ (用国有工业总产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分年的统计年鉴。

(一) 模型结果分析

表 3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全国 FE	全国 TSLS	东部地区 FE	东部地区 TSLS	中部地区 FE	中部地区 TSLS	西部地区 FE	西部地区 TSLS
C	0.099 (1.19)	0.194** (3.82)	0.856 [*] (1.97)	-0.124 (-1.03)	-0.234 (-1.54)	0.003 (0.04)	0.142 (1.32)	0.389** (5.26)
FD	0.990** (6.20)	1.523** (10.57)	-1.082 (-1.16)	3.581*** (5.33)	2.089* (5.78)	2.025** (8.44)	1.302** (6.58)	0.890** (6.84)
$FD \times SEGM$	-2.599** (-18.02)	-5.751** (-4.05)	-2.435** (-4.78)	-9.698** (-4.78)	-4.155** (-12.7)	-3.072* (-2.08)	-1.901** (-10.30)	-4.935* (-2.23)
K	0.188** (5.47)	0.266** (2.72)	-0.059 (-0.32)	0.771*** (4.38)	0.162** (2.94)	0.259** (2.78)	0.125** (2.29)	0.186 (1.27)
$OPEN$	1.574** (18.47)	0.724** (9.07)	1.912** (8.24)	-0.034 (-0.31)	1.475** (4.38)	0.123 (0.30)	0.946** (5.82)	0.755** (3.17)
$STATE$	-0.575** (-11.92)	-0.671** (-10.68)	-0.895** (-2.73)	-1.449** (-4.66)	-0.337** (-4.47)	-0.531** (-9.70)	-0.596** (-8.66)	-0.644** (-7.64)
Obs	336	280	120	100	96	80	120	100
Adj R^2	0.9368	0.8018	0.9424	0.6736	0.8942	0.8611	0.8573	0.6655
Woolridge 检验	89.374**	-	61.082**	-	650.91**	-	61.67**	-
Hausman 检验	54.51**	-	14.57**	-	36.08**	-	6.94**	-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5%、10% 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由于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 Woolridge 检验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我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形式 (模型 1) 建模。另外,由于我们认为财政分权是一项制度安排,可能存在内生性而造成模型回归结果的偏误,因此我们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 (TSLS) 的方法 (模型 2) 来克服制度内生性的问题,将财政分权程度和市场分割程度作为内生变量,得到无偏的回归结果。我们采用模型 2 的结果作进一步

的分析。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我国跨省区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为了克服可能存在而又无法识别的异方差,本文的估计系数为 White 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估计值。

模型结果显示,各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财政分权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Delta Y_{it} / \Delta FD_{it} = \beta_1' + \beta_2' \times SEGM_{it}$,我们将 β_1' 视为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将 $\beta_2' \times SEGM_{it}$ 视为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之所以将其视为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是因为它不仅与回归系数有关,而且与市场分割程度有关,其影响程度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程度提高 1%,人均 GDP 平均可以提高 1.5%。但另一方面,分权制改革的成本,即市场分割与诸侯经济又会极大地削弱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分割程度提高 1%,对财政分权的促进效应的削弱度为 5.75%,大大超过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综合两方面的作用来看,在全国的市场分割程度的均值 0.0587 处(见表 1),财政分权程度提高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为 1.19% [即 $(1.523 - 5.751 \times 0.0587)\%$,见表 3]。

从分地区的模型结果来看,财政分权对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均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东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中部的促进作用,对西部的促进作用最小。原因之一是由于东部省份之间的区域合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广泛和深入,目前我国形成的区域经济区,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等基本都在东部,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东部同级政府之间财政竞争效率的损失。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有一些区域合作,但其深度和广度远不如东部地区,因此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的改进作用有限,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差异。其次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官员有着很强的政治晋升激励作用,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晋升竞争中获得好的绩效,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推动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通过政府投资促进本地的 GDP 增长。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财政收入有限,更多地要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财政独立性低于东部地区,由于转移支付一般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地方政府无法根据自身的偏好对其进行调整,为了满足自身的财政支出需求只能通过增加预算外收入的方式来实现。按照陈抗、Aye L. Hilman 和顾清扬(2002)的观点,增加预算外收入是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实施的“攫取”行为,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这是造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制度对其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市场分割会部分抵消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市场分割程度提高 1% 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抵消作用分别为 -9.7%、-3.1% 和 -4.9%,市场分割对东部地区的负影响要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区域一体化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区域经济集聚的“锁定效应”使得东部各省份加剧市场分割的成本大大增加。而对中西部省份来说,由于其在发展初期没有东部省份的政策支持,中西部省份的财力不足导致其对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较强(张晏、龚六堂,2005),致使中西部省份的政策选择陷入了“囚徒困境”,即一方面中西部省份为了增加本级地方政府的收入必须保证本地的税基,只有本级地方政府收入增加,政府才可以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尽更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分割可以在短期内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当其他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的政策时,本地政府如果想要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也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这样才可以在以 GDP 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下提高本地经济的相对表现(陆铭,2009)。综合两方面的作用来看,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的均值 0.072、0.0516 和 0.0511 处(见表 1),财政分权程度提高 1%,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分别为 2.9% [即 $(3.581 - 9.698 \times 0.072)\%$]、1.87% [即 $(2.025 - 3.072 \times 0.0516)\%$] 和 0.64% [即 $(0.89 - 4.935 \times 0.0511)\%$]。

(二)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可能(Madariaga and Poncet 2007),我们前面使用了工具变量的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在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对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均采用了时间滞后形式来检验前面方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由于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中,一期时间滞后变量也可能是内生的,因此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均采用了二期时间滞后形式,而被解释变量则是当期形式。

表 4 中的 Pooled 模型为混合估计模型,FE 模型为固定效应估计模型。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各回归系数保持了稳定性,即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分割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保持显著,而且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根据稳定性检验的估计方法,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市场分割程度的均值处,财政分权程度提高 1%,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分别为 0.52%、1.95%、1.35% 和 1.12%,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

结论相同。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全国 POOL	全国 FE	东部 POOL	东部 FE	中部 POOL	中部 FE	西部 POOL	西部 FE
<i>C</i>	0.140 ^{***} (3.02)	0.327 ^{***} (2.92)	0.059 (0.75)	0.707 ^{***} (2.75)	0.123 (1.61)	0.114 (0.48)	0.321 ^{***} (7.55)	0.313 ^{***} (2.32)
<i>FD</i> (-2)	1.642 ^{***} (11.09)	0.719 ^{***} (3.25)	2.540 ^{***} (10.29)	2.190 (0.29)	1.374 ^{***} (3.87)	1.599 ^{***} (2.69)	1.075 ^{***} (9.65)	1.238 ^{***} (4.87)
<i>FD</i> (-2) × <i>SEGM</i> (-2)	-3.535 ^{***} (-12.03)	-3.363 ^{***} (-20.86)	-3.927 ^{***} (-6.87)	-3.389 ^{***} (-13.50)	-4.289 ^{***} (-6.84)	-4.881 ^{***} (-13.48)	-2.526 ^{***} (-10.12)	-2.282 ^{***} (-10.90)
<i>K</i> (-2)	0.375 ^{***} (5.75)	0.276 ^{***} (7.29)	1.034 ^{***} (7.99)	0.288 ^{***} (3.34)	0.285 ^{***} (2.46)	0.242 ^{***} (4.00)	0.223 ^{***} (3.53)	0.204 ^{***} (3.58)
<i>OPEN</i> (-2)	0.805 ^{***} (11.13)	1.689 ^{***} (16.52)	0.179 ^{**} (2.31)	1.598 ^{***} (10.25)	0.999 [*] (1.88)	1.538 ^{***} (3.63)	0.853 ^{***} (4.35)	0.571 ^{***} (2.31)
<i>STATE</i> (-2)	-0.602 ^{***} (-10.00)	-0.621 ^{***} (-9.805)	-1.035 ^{***} (-8.03)	-1.153 ^{***} (-4.77)	-0.347 ^{***} (-2.78)	-0.511 ^{***} (-5.09)	-0.624 ^{***} (-10.07)	-0.680 ^{***} (-8.38)
Obs	280	280	100	100	80	80	100	100
Adj <i>R</i> ²	0.8188	0.9457	0.6115	0.9454	0.5867	0.8653	0.7627	0.8541

四、结论

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大大增强, 改善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但由于不同地区区域整合能力的差异和扩大自身财政收入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差距。另外, 我们也应该看到, 近些年来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如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等, 由于各地区的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在同一个激励框架之下, 东部地区的经济趋于整合,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 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整合则陷入了“囚徒困境”,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

根据本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要继续保证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 减少其带来的负面作用应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中央政府要改进对地方政府以 GDP 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 加入更多的“软指标”, 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人民满意度等, 减少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负面效果。其次, 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中西部的政策扶持力度, 帮助其跳出“囚徒困境”,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西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可以大大促进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生能力”的形成, 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近些年来, 中央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政策就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很好的尝试。最后, 中央政府可以考虑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选择权、税基和税率调整权, 充分考虑各税种的特性及各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特点, 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合理、科学、稳定的划分, 逐步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 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 4 期。
2. 陈抗、A. Hillman 顾清扬, 2002《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第 2 卷第 1 期。
3. 陈敏、桂琦寒、陆铭、陈钊, 2007《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发与国内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7 卷第 1 期。
4. 傅勇、张晏, 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 3 期。
5. 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 2006《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第 2 期。
6. 黄隽琳、王敬云, 2006《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中国工业经济》第 2 期。
7. 陆铭、陈钊, 200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8. 陆铭、陈钊, 2009《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第 3 期。
9. 刘小勇、李真, 2008《财政分权与地方分割实证分析研究》,《财经研究》第 2 期。
10. 李涛、周业安, 2008《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支出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 11 期。
11. 林毅夫、刘志强, 2000《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12. 乔宝云, 2002《增长与均等的取舍——中国财政分权政策研究》, 人民出版社。
13. Poncet Sandra 2002《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

14. 王永钦、张晏、章元、陆铭, 2007: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 1 期。
15. 于东华、刘运, 2009: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测度与辨识——基于方法论的文献综述》,《世界经济文汇》第 1 期。
16.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 6 期。
17. 周黎安, 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 7 期。
18. 张晏、龚六堂, 2005: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5 卷第 1 期。
19. 张晏等, 2005: 《标尺竞争在中国存在吗?——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研究》,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 郑磊, 2008: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科学》第 1 期。
21. 郑毓盛、李崇高, 2003: 《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22. 赵奇伟、熊性美, 2009: 《中国三大市场分割程度的比较分析: 时间走势与区域差异》,《世界经济》第 6 期。
23. Buchanan, J M. 1965.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32(125): 1-14
24. Fan, C. Simon, and Xianglong Wei 2003 "The Law of One Price: Evidence from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of China" Working Paper, Lingnan University
25. Jin Hu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9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stanford.edu/faculty/workp/swp99013.pdf>
26. Lin J Y., and Z Liu 200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1): 1-22
27. Madariaga N., and S Poncet 2007 "FDI in Chinese Cities: Spillovers and Impact on Growth" *World Economy*, 30(5): 837-862
28. McKinnon R. 1997. "Market-preserving Fiscal Federalism in the American Monetary Union." In *Macroeconomic Dimensions of Public Finance*, ed, B Mauro and T. Ter-Minassian, 73-110. London: Routledge
29. Mody A., and F Wang 1997 "Explaining Industrial Growth in Coastal China: Economic Reforms and What Els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2): 293-325.
30. Naughton, Barry 1999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Conference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31. Oates Wallace E. 1972 *Fiscal Federal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32. Oates Wallace E. 199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Tax Journal*, XLVI Vol 2 237-243
33. Parsley David C., and Shang-jin Wei 1996 "Convergence to Law of One Price without Trade Barriers or Currency Fluctu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4): 1211-1236
34. Parsley David C., and Shang-jin Wei 2000 "Explaining the Border Effect: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Shipping Cost and Geography. NBER Working Paper 7836
35. Parsley David C., and Shang-jin Wei 2001. "Limiting Currency Volatility to Stimulate Goods Markets Integration: A Price Approach." NBER Working Paper 8468
36. Poncet S 2003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14(1): 1-21
37. Qian Yingyi and Roland Gerar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1143-1149
38.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83-92
39. Qian Yingyi and C Xu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2): 135-170.
40. Samuelson, P. 1954 "Theoretical Note on Trade Problem."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6(2): 145-164
41. Tang, K. K. 1998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Province: A Business Cycle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13(4): 549-570
42. Tiebout C.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5): 416-424
43. The World Bank. 1994. *China: 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44. Weingast B.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11(1): 1-31.
45. Xu Xinpeng 2002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 116-133
46. 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

(下转第 111 页)

21. Campbell J. Y., and N. G. Mankiw. 1990 "Permanent Income, Current Income, an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8(3): 265–279.
22. Feldstein, M. 1987. "Budget Deficits, Tax Rules,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1970
23. Gong G., A. Greigner, and W. Semmler. 2001. "Growth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in the EU." *Empirica* 28(1): 3–19.
24. Haan J., and J. E. Sturm. 1995. "Is It R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Deficits and Real Growth: New Evidence Using Long-run Dat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4): 98–102.
25. Hansen, A. H. 1941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W. H. Norton & Company, Inc.

An Analysis of the Net Effect of National Deb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Ren Hui and Fan Jin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Abstract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debt and the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paper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by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and conclude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net effect of national debt on consumer has gone through three major stag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In the first phase 1981–1988, it's zero; in the second phase 1989–1994, it's negative; in the third phase 1995–2007, it's positive. Secondly, the varia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ffected by national debt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urban resident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hases, both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net effect of national debt on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urban residents. Finally,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debt issuance system and market prosperity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the net effect of national debt on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will be stimulated by the national debt not only for productive investment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Key Words National Debt; Residents' Consumption;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Net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 102 页)

47. Zhang T., and H. Zo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2): 221–24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Economy Growth: Based on Analysis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1996–2007

Li Guozhang and Liu Jinnu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hinese-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 design. A lot of papers have studied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y obtained different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viewing from market segmentation, we use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1996–2007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tax system reform in 1994. The result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s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namely market segmentation, has weakened this positive function. And this weakening resul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uch larger than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Due to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natural resources conditions, policy environment and so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n play larger positive fun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even under the same incentive framework.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TSLS of Panel Data

JEL Classification H70; D72; P20

(责任编辑: 彭爽)